

女权主义视野中的丁玲小说

魏杨斌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鹰鸟飞翔的姿态一直是丁玲理想的妇女生存状态,自由翱翔,无拘无束。丁玲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一直关注着中国妇女问题,这缘于母亲的影响和特殊的童年经历。在女权主义视野下,丁玲的作品对女性的关注,体现在外在的社会世界中模糊性别差异,赋予女人以社会中人的属性,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生存权利。同时在内在的女性世界中凸显女性性别特性,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旨在享受社会赋予女人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之外,在意识上也要得到真正的觉醒,对女性自身的价值有自觉的认可,以此来达到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关键词】女权主义;丁玲小说;飞翔;平等;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1-0049-04

“看见天空中飞旋的鹰鸟,就希望自己也生出两片强而有力的翅膀,向上飞去,飞到不可知的地方去,那地方充满着快乐和幸福。”(《阿毛姑娘》)正如作品中所期待的那样,鹰鸟飞翔的姿态一直是丁玲理想的妇女生存状态,自由翱翔,无拘无束。丁玲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一直关注着中国妇女问题,这缘于母亲的影响和特殊的童年经历。少年时代便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妇女解放运动的丁玲,自初登文坛起,就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有意再现女性在社会中不平等现象,意在唤起女性自觉,重塑男女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宣扬女性自我独立意识,这内在体现的是女权主义的一种苏醒。

丁玲的作品对女性的关注,是对女性价值身份的认同。她运用解构主义改变女性“第二性”的角色,并重新建构一种颠覆性的角色定位,将男子从以往社会主流的地位拉出,同时将以往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甚至被忽略的角色——女人,凸显并拉进人们的中心视线中,唤起人们的注意,进而肯定女性存在的自身价值。在解构以往的男女传统意义上的尊卑地位的同时,建构新时代的平等的男女地位。作品中妇女飞翔的姿态,是对妇女真正享受作为人这一属性的价值和权力的企盼,亦是女权主义的体现。

女权主义根据韦氏《新世界字典》定义:“女权主义系指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应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因此女权主义旨在追求一种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权利的争取,一方面表现在对现实社会中存在价值的追求,具体包括争取女性政治言论中的话语权,法律中的保障权,教育中的受益权,经济上的独立权等等,这是对社会中一个确实存在的人这一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女性

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一个体现,这是内化为自身的一种意识上平等的权利。丁玲作品中便深深烙印着女权主义的色彩,以上谈及的外在和内在的价值平等的追求,在其作品中体现颇为深刻。

一 外在世界:社会平等权利的追求

丁玲对于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的现象,早有所关注,于是自少年起,便积极参加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丁玲自身这种女权主义精神的觉醒是很早的。正是过早意识到这种不平等的存在,为了改变这一切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去争取在社会存在中女性的价值。丁玲有意模糊在社会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别差异,追求的是社会中人的权利和价值,女性理应与男性在社会中同等享受法律、教育、经济、家庭等方面应有的权利。

在父权制统治社会中,女性扮演着一个重要“物”的角色,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在于满足了父权社会中男性的需要,填充了男性在社会中其他同性人所不能给予的空白,但无论角色重要程度达到何种深度,女性充当的也只能是“物”的角色,它隶属于男性的财产,“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个戒指。”^[1]在父权制的法律习俗中,西蒙·波娃用“第二性”来指代女性的地位,她们是男人的专属物品,“只被许多人拿来玩弄着,调笑着”(《阿毛姑娘》),没有独立的自由和法规的保障。于是女权主义首先要解放的便是在父权制法律习俗中女性这种奇怪的生存状态,“得不着我所等待于他的赐予。为什么他仅仅只懂得我的无用,我的不可轻侮,而不够了解他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种怎么样的地位!”(《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一声感叹则是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后的思考。

收稿日期:2013-01-10

作者简介:魏杨斌(1989-),女,辽宁本溪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糊糊涂涂自以为是幸福地快乐的过了这么久。但现在不不然了。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女权主义意识在丁玲小说中开始苏醒，她们争取一个人存在于社会基本的权利和基本的自由。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作为男人的参照物存在，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边缘性的角色让女人经常被男人忽略本属于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以至于经常忘记从人的价值角度去看待女人，忽略了女人真正的生活和快乐。“肖云也奇怪的望着美琳，从来就没有听见她说过不快乐的话。”（《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男人用标签着男性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女性的存在价值，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做法。以至于在这种价值标准之下，辨别不出女性真正的快乐与悲伤，女性生活得快乐与否，是取决于男性的看法，而不是女性自己的感觉可以表达的。在这种父权、夫权的压抑下，女性长久的遵从姿态，激起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开始呐喊并争取在社会上等同于男性的平等地位，享受社会上作为“人”的价值与权力，摆脱“你老把我当小孩”（《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这种无性别价值。

“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一定要有经济，还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5]钱和屋子是对于妇女现实生活中经济不独立和没有自由的真实写照。妇女在社会中经济地位低下，只能对男人进行经济上的依赖，而这造成的影响则是对男人的顺从服帖，没有经济来源，便无了生存的根本，“她是幸福的，她不否认，因为有他爱她。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感到不满足起来，她很诧异，过去那么久她都是糊糊涂涂地过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男人为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依赖，女人因此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但是内心深处这种不满足正是超越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的，是一种精神领域的空白，她们渴望自己本身可以在社会中产生价值，但这需空间和自由，女人在获得男人提供的经济食粮后，只能对其顺从，失去了基本的空间与自由。于是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妇女若想取得真正的解放和独立，必须在经济上独立，进而寻求自己在社会中的自由权利，拥有到一间屋子，

当女权主义在妇女意识中苏醒，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之后，在教育上也应当争取与男人享受一样的受益权。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教育会洗涤心灵，优等的教育使人的心智成熟，而在父权制的社会中，男性作为主体的中心，教育成为男性的特权，在西

方，有着女权主义者享受不到平等教育权的反抗运动。同样在中国也有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专制统治的背景，丁玲的小说中那种女性对于教育的憧憬与努力，彰显着女权主义的光芒。“小蕊要发愤读书，要争气。”（《过年》）在困境中的女性，将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读书，教育会使一个人变得有着丰富的阅历，有能力去为社会做出贡献，进而提升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做什么事好呢？有时还想进学校去。”（《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受教育的想法在丁玲笔下的变成女性一种本能的想法，这是对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反映。再如《母亲》中曼贞对于享受教育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显示了当代觉醒女性对于知识的渴望，争取教育平等受益的权利。

丁玲在小说中强调社会中男女性别之间的模糊界限，意在表现男人与女人同属“人”的价值，这是女权主义在争取社会中女性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与男人同等在社会上享有法律、经济、教育上的权利，简言之女权主义者的这种追求是对社会中女性应有的平等权利的追求，体现的是作为“人”这一属性在社会上应有的权利。

二 内在世界：女性本身价值的自我认同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土壤，因此我们在文学上借鉴女权主义的理论，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本土背景。西方的女权主义产生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妇女对社会中不平等待遇发起的自觉行为。然而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往往与社会、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发起者有男人也有女人，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早已经关注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并于1954年颁发的宪法规定：“中国妇女与男子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同等的权利。”法律法文的明文规定，看似给予妇女在社会中作为人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但是这样的一种权利和保障，从某种程度上更似为一种符号。只是在社会中从表面给予了一种可以证实妇女已经解放的依据，然而从根源去追究人们关于妇女解放的意识，都是无果的。可以讲，中国的妇女从意识上并没有获得如西方女性那种自觉的状态。丁玲说过：“在社会主义中国，基本上已经是男女平等，但在思想意识上，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残余还比较严重。”^[15]所以在若想获得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在女性的意识根源上进行启蒙，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内在的女性世界中强调自己女性的价值，进而认同女性自我价值的存在。

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一直被压抑,她们委屈于父权与夫权,顺从男性的安排与摆布,她们犹如一面奇怪的镜子,“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112]于是这更助燃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的旺盛。“起始阿毛很怕他,不久就很柔顺的承受了,且不觉的也会很动心,很兴奋,有时竟很爱慕起这男人了。”(《阿毛姑娘》)阿毛这种由害怕到顺从再到后来的动心甚至爱慕,这一系列的变化,正是在长久的父权制社会压抑中形成的,女性在潜移默化之中习惯了男权的压迫甚至生发爱慕。于是具有着女权主义意识的丁玲,以呐喊的姿态,唤醒那些迷醉于父权社会“不知感到的是幸福还是痛苦”(《阿毛姑娘》)的女性,颠覆夫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地位,杀死“房间里的天使”。

丁玲旨在启发女性意识的自觉,告别了“房间里的天使”的角色,认同自我女性的价值。因为“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13]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卑下,而是在男性的鄙视中,冠以卑下的定义,在男性价值标准体系中后天形成了女性卑下地位的错觉。因此妇女一定要从根源上意识到这种错觉的存在,对于“不知道为什么,生活总没有起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这样的疑问给予肯定的回答,就是女性要认同自身女性的价值独特性,对以往父权制以男人为中心价值体系的颠覆,杀死了“房间里的天使”,重生的是一系列的“莎菲系列”女性。“‘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因为他所使我迷恋的那东西,在吻我时,我已经知道是如何的滋味”(《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在性政治中,女性不再处于第二性的位置上,而以叛逆者和征服者的姿态,享受着征服男性所带来的愉悦。“我恨不得用脚尖踢他出去,不过我又为另一种情绪所支配,我向他摇头,表示不厌烦他的来到。”(《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丁玲以解构主义这一方法论,改变了“父权制的社会里,男与女处于一种主动和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115]丁玲解构了男性世界中的性歧视,颠覆了以往父权制的性政治策略,实现妇女“第二性”的解放。从而又重新建构了社会中妇女的新世界,让男性为之感叹“这女人,多么温柔的啊,现在也弃掉他,随着大众跑去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妇女这种飞翔的姿态,才是真正属于妇女本身的姿态,但是女性的飞翔过程中由于父权长久以来造成的影响,飞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困惑,“她本是为了不愿再见那些虚伪的人儿才离开那所住屋,但她便走上光明的大道了吗?”(《梦柯》)得以真正意义上妇女的解

放,一定在思想意识上觉醒,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肯定,女性的意义也不会“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莎菲女士的日记》),而是以一种内在肯定的强大力量而永生。

父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物的角色,没有主体性的概念,只能以参照物的形式存在,而女同性恋则颠覆了这种常规的认识。“这样相爱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地延续下来。既然不会凭空闯进一个更令人爱慕的角色,而谁也不觉悟这勉强安慰自己的感情关系,并不能满足那真真的欲望。”(《暑假中》)在丁玲的作品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并无太多有关性欲望的需求。体现的是在父权制文化下对女性强制要求的一种排斥和反抗。在父权制社会中,一般认为妇女只能选择异性相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认为只有男性才是女性最后的归宿。而这样的一种“合理”的安排,被女权主义者认为是一种“强制性”的安排,于是她们大胆选取同性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这是一种反抗而又激进的做法。“女同性恋的经历,如同做母亲的经历一样,是深切的女性经历,有其特殊的苦恼、意义和可能性,如果简单把它与其他受蔑视的性关系混为一谈,我们是无法理解这些因素的。”^[119]但是某种意义上讲,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超越了人类学上“男性是超越,女性是持续”的位置。“女人希望以此方式,在自己为‘物’之景面下,找到自我之体认,但她将试着在她的‘另一我’中找或自己”^[117]丁玲作品中对女同性恋的涉及,在妇女心理方面是一种精神安慰,“静静地享受着承淑轻轻挥动蒲扇送过来的微风和那刚扑上的香粉味,她把眼睛眯着,细闻这香气。”(《暑假中》)嘉琰这种享受,是承淑给予最好的精神寄托,在“所有的男人都是敌人”^[118]的世界中,女性之间对爱的汲取,是长期被压抑状态下的精神释放,是对父权制社会对妇女压迫最有力的反抗,丁玲解构着男女世界所谓的常规法则,又强化了女性内在世界中女性的性别角色,旨在唤醒女性自身价值的自我认可,彰显了女权主义精神。

在丁玲文学世界中追求“飞翔是妇女的姿态”^[120]。在女权主义视野下,体现在外在的社会世界中模糊性别差异,赋予女人以社会中人的属性,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生存权利。同时在内的女性世界中凸显女性性别特性,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旨在享受社会赋予女人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之外,在意识上也要得到真正的觉醒,对女性自身的价值有自觉的认可,以此来达到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89.
- [2]丁玲.谈创作[A].丁玲全集(第8集)[C].张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3]西蒙·波娃.第二性[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5]艾德里安娜·里奇.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A].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 [6]贝尔·胡克斯.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7]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黄晓红译.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Dingling's Novels on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WEI Yang-b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e flying attitude of eagle is always Dingling's ideal women's survival condition, flying freely. In the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Dingling's literary career, she had concerned about the Chinese women's issues. This is due to her mother's influence and her special childhood exper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the attention to women in the Dingling's novels reflects in the aspects of fuzzy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xternal social world, which gives a woman the person's property to fight for equality with men's right to exist. At the same time she highlights female gender and puts emphasis on the value of the women themselves. She intends to let women enjoy equal rights with men in the society and also let women have the real awakening in the consciousness and know the value of the women themselves consciously. Dingling uses this metho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men in the true sense.

Key words: Feminist; Dingling's novels; Flying; Equality; Liber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6页)

- ④孙昌武、李贲扬注,《杂譬喻经译注(四种)》,中华书局,2008年。
- ⑤衣川贤次,《以敦煌写经校订〈大正藏〉鱼议》,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亦见董志翘《汉语史研究应重视敦煌文献》,《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To Revise Jing Lü Yi Xiang via Variants of Buddhist Sutras

LU Jing

(Five-year Centr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Abstract: Jing L ü Yi Xiang is of great bibliographical value as the first Buddhist reference book in China, so it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by Buddhism researchers. Jing L ü Yi Xiang has many versions and therefore its variants are rich in number and various in types. These diverse variants can help to correct the mistakes in Jing L ü Yi Xiang included in Taisho Tripitaka. Moreover we can organize a better version of Jing L ü Yi Xiang by virtue of comparison among its abundant variants.

Key words: Jing LV Yi Xiang; variants; Collate

(责任编辑:张俊之)